



董必武诗中的矢志不渝

□ 李玉邦

董必武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法学家，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董必武诗选》共精选300余首，其诗作是其光辉一生革命生涯的生动写照，也是对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历程、重大历史事件的生动记录。细读这些诗篇，可以体会董必武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人民军队和英雄战士的热情讴歌，对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的必胜信心。

“群英结党救中华”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参加了党的一大，对一大的珍视、回忆、思考，在其一生都是常察心中的。

1961年7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于中国共产党四十年生之际开馆，董老写下《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题诗》：“无语形容大事功，人民六亿鼓东风。进程历历皆罗列，旭日光芒照眼红。群英结党救中华，脱颀人来焕彩霞。星火燎原谁料得？卅年成就浩无涯。蛻出中华面貌新，金丹换骨脱凡身。归依马列求真理，怪物而今视若神。”这首诗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为了救亡图存、拯救中华，我们依靠马克思主义真理使古老的中华大地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变。

1964年清明之际，董老在江浙一带考察工作。清明当天从杭州去南京，经过嘉兴时他去南湖访旧，回想起1921年7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情景，由于会场受到法租界巡捕房暗探干扰，会议转移至南湖画舫上继续召开，讨论通过了第一部党纲，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往事历历，秀水泱泱，红船依旧，触景生情，他写下了《清明节过嘉兴访烟雨楼》：“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导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这首诗重点强调了我们的党成立是为了工农劳苦大众，引导工农，依靠工农，唤醒工农千百万，终于实现了人民的翻身解放。

“甘为民仆耻为官”

董必武的诗中，有大量歌颂人民军队的诗章。董必武17岁考中秀才，董家曾对他寄予“光宗耀祖”的期望，但他“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毅然走上了充满荆棘的革命道路。投考新学时，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必武”，深信救国救民就必须有武装斗争不可。“八七”会议后，1927年11月，中共鄂东特委举行黄麻起义，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号召工农开展武装斗争，掀起了湖北秋收暴动、年关暴动的革命高潮。1934年，董必武以年近半百的年龄和体弱之躯参加了长征，在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其间拉着马尾巴爬过雪山，拄着拐棍走过了草地。他在《挽陈赓大将同志》中回忆艰苦卓绝的长征，深情写道：“从军原是为人民，百战勋劳总不矜。矫捷沉雄谁得似，票姚差可望神鹰。……忆昔长征干部团，曾经履武并随肩。羨君年富多材勇，国栋何期早作仙。”在长征中，为了理想和信念，董必武和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一起，革命理想高于天，万水千山只等闲，是何等的矫捷沉雄，特别是开篇首句就表明了“从军原是为人民”的鲜明立场。

在《祝朱总司令六秩荣寿》中写道：“骨头生若铁般硬，胸次真如海洋宽。要作主人不作客，甘为民仆耻为官。”这首诗是陕甘宁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真实写照。对人民军队普通战士，他充满了深厚情谊，在《读王杰同志日记》中写道：“共向雷锋学，如君领会多。一心为革命，三载保无讹。死义泰山重，书香贝叶过。利人糜顶踵，示范耿星河。”极力称赞了王杰同志把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高贵品质。在《祝贺八一建军节》中写道：“义旗八一举南昌，争取人民大宪章。土地要归农所有，工时须以八为常。狂澜倒侧同心挽，旭日方升旦气扬。卅载威名常胜号，只缘军属党中央。”这首诗歌颂了人民军队建军是为了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深刻阐明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遵从马列无不胜”

董必武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总是充满必胜的信心。1964年3月20日，他在《偶成》一诗中写道：“东风吹浩荡，势已压西风。初日瞳瞳上，江山耀眼红。”1975年3月5日，是董老89岁生日，他克服疾病，抖擞精神，在病榻上写下了《九十初度》这首诗：“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新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这首诗概括了自己一生的历程，表达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特别是诗的最后两句，体现了他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坚信我们党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前途就如旭日东升，从一个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这是董老发自肺腑的心声，丹心碧血，光照千秋，值得我们永远弘扬。

老一辈革命家诗词赏析



《柳堡的故事》：革命迎来艳阳天

□ 李志敏

有一年游扬州，我专门去看了闻名遐迩的柳堡，去后才知道柳堡原名留宝头，后改名刘坝头，是电影编剧石言为体现一部作品既讲战争又叙情感的風格，而将刘坝头又改名柳堡——因“柳”字多情、“堡”有兵味，何况刘坝头上也确实长了许多大柳树。而就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后，柳堡便扬名天下了，这部电影就是由新中国第一位女性电影导演王苹执导的《柳堡的故事》。一部文艺作品能为一个美丽的地方命名，实在让人惊叹红色经典的影响力与艺术魅力。

(一)

《柳堡的故事》拍摄于1957年，作为军旅题材的红色经典，影片并没有重点刻画与营造大规模枪林弹雨的战斗场面，而是独具匠心地聚焦军人的整训与情感。1944年春，新四军某部一个连队进入苏北柳堡村整训，四班副李进与当地姑娘二妹子产生了感情。在指导员的帮助下，李进抛开个人情感随部队南征作战。五年后，已晋升连长的李进带队途经柳堡村，与已入党成为干部、正带领粮船踊跃支前的二妹子欣喜重逢。

应该说《柳堡的故事》选材独树一帜，依然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主题，又浮动着一抹似有若无的情感，背后闪耀的仍然是金色的革命光辉。纵观整部电影，李进与二妹子从相遇相识、互生情愫，再到南征作战、胜利重逢，影片巧妙地情感叙事融入革命叙事，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前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及战争中的敌我矛盾，昭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意涵：只有人民大众获得彻底解放，才能真正实现个体幸福。

影片中，当副班长李进因和二妹子在柳前月下“谈情说爱”，而被指导员要求向大家作思想汇报时，李进向大家讲述了二妹子深夜前来是缘于其身陷险境，彼时电影以叙叙的方式牵引出一个敌人——害死大妹子又企图强娶二妹子的伪军中队队长刘胡子。其后，刘胡子果真派地主汪掌柜带着狗腿子将二妹子蛮横地抢走，部队闻讯即刻兵分两路，将二妹子合力救出。

此时，二妹子的遭遇让李进深刻地意识到，革命斗争异常残酷，需暂时抛开个人情感，彻底解放全中国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李进在对敌斗争和自我斗争中迅速成长，“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



住；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我宁死也不受不了！我入党时说过，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对二妹子而言，新四军对她的拯救，不仅使其身体获得解放，更促成了其精神成长。二妹子听李进说道“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她立马反观自身“平等？我也能平等？”在经过思想启蒙后，二妹子在人民军队的帮助下彻底改变了自身命运——她不但幸运地挣脱了刘胡子的魔爪，更光荣地成长为了一名党的妇女干部。

(二)

《柳堡的故事》全片于坚韧刚强之中撒落了些许温柔，让人印象深刻。此种淳朴含蓄的情感得以成功表达，除去男女主人公精心运用细腻的眼神、细微的表情、不经意的动作，朦胧而隐忍地准确传达外，还源于二妹子对李进的情感中，包含了劳苦大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由衷爱戴与拥护，以及人民群众对光明与希望、和平与民主的热切期盼与向往。二妹子在革命斗争中的情感选择，将这一切并置呈现，使之互为一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主题曲《九九艳阳天》这男女互表心曲的江南小调，于全片恰到好处地四次响起，将潜隐于革命叙事当中的情感叙事精巧地连缀起来，充分突显了主人公丰盈的心理活动与情感流转，串联起李进与二妹子从相识、相处、离别到重逢的整个情感历程。

歌曲第一次响起，李进和四班战友们一块帮房东田大爷修房子和院墙，“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初次响起的《九九艳阳天》是欢快明亮的男声，饱含着战士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时，田大爷外出避难的女儿二妹子在歌声中回来了，“哥哥惦记着呀小英莲”，歌曲至此似乎预示了一个美丽的故事即将开启。

歌曲第二次响起，二妹子欢喜地到河畔为战士们收回晾晒的衣服。这时的她已与李进互生好感，且向李进表达了参军的

意愿。“风向呀不定那个车难转呀，决心没有下呀怎么开言”，二次响起的《九九艳阳天》是甜美的女声独唱，十分贴切地释放并外化了二妹子彼时的心绪与情感。

歌曲第三次响起，是在蒋桥战斗胜利后部队即将南征作战，四班战士马小宝唱道：“这一去呀翻山又过海呀，这一去三年两载呀不回来。这一去呀枪如林弹如雨呀，这一去革命胜利呀再相见。”马小宝是个乐天派，在柳堡的河汉子里无忧无虑地撑船高歌。坐在船头的李进却在沉思：尽管柳堡有他惦念和向往的，但毫无疑问，他将义无反顾地随部队南下征战。

歌曲第四次响起，是五年后已成为连长的李进带队途经柳堡，与已入党当了干部的二妹子在运粮船上欣喜重逢、并立船头。“哪怕你一去呀千万里呀，哪怕你十年八载呀不回来。只要你不把我英雄忘呀，只要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末次响起的《九九艳阳天》依然是女声，婉转地表达了二妹子对李进的深情与承诺。而重逢时李进那一声激动的“田学英同志”，更将歌曲里柔情坚贞的“小英雄”形象与剧情里情深意笃的二妹子田学英完全对应起来。

(三)

《柳堡的故事》中二妹子虽为女一号，实际台词却并不多，最重要的一段台词是表达参军意愿。但影片充分发挥了大银幕视听语言的独特优势，运用迷人的视听镜头，彰显了人物的清纯甜美、情感的清新动人与心灵的清静美好。

导演别具匠心地让二妹子在李进的歌声中出场，且调度了一个抒情长镜头——杨柳垂堤、小河潺湲，二妹子和她爹田大爷划着小船映入眼帘，挽着包袱坐在船头的二妹子渐行渐近，大瓣子的背影淳朴柔美。其后，二妹子回到家中，看到那么多新四军战士正在为她家修屋顶、刷院墙，于是在战士们注视下，她感激又腼腆地穿过院落，匆匆进到屋里。从二妹子父女返乡至归家，这两处的视线引导与空间调度新颖别致，成功地抢抓了观众注意力。

而当部队即将出发，柳堡的乡亲们都不约而同地前往送行时，二妹子也去了，但她只是独自一人站在一棵柳树旁远远目送、遥遥眺望。彼时影片勾勒出一棵柳树旁站着一个人影子、梳着一条大辫子的远景镜头，观众在镜头里看不清二妹子的脸，但其静默张望的远景透出的淡淡忧伤，却使银幕效果比看清她的脸更写意和动人。在中国的古代文化里，柳意味着送别。《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李进抱着要解放千千万万个劳苦大众的坚定决心，头也不回地走了；倒是善解人意的指导员替李进回望了一下，而正是这一回望为五年后李进与二妹子在指导员的牵引下欣喜重逢埋下伏笔。

《柳堡的故事》中苏北特有的蜿蜒河堤、独木小桥、依依杨柳以及风车、芦苇、雁阵，是影片完美的视听饕餮的重要构成。尤其柳堡的水源丰富、河道密集，片中流水与田亩纵横交错、水路与陆路相映成趣，柳堡所独具的水网中的村落特色，不仅因风景如画而渲染出浓郁的抒情氛围，更不动声色地参与和丰富了电影叙事。

比如，柳堡那一湾河水在片中反复出现，具有特别的意蕴。当刘胡子带人欲强抢二妹子时，二妹子无奈地浸在河里，正是借助河水和芦苇的掩护，方逃此一劫；而当汪掌柜趁着夜黑风高，带着狗腿子强闯田家硬拖走二妹子时，弟弟小牛也是藏在河中，方得以伺机逃脱并赶往新四军驻地通风报信。被抢走的二妹子被羁押在汪掌柜的船上，依然是沿水路而行，被强送至刘胡子所在的蒋桥；而为营救二妹子，新四军兵分两路，一路疾驰于河岸沿陆路追寻，一路蹑河乘船沿水路救援，最终是水路救援的战士一枪打断了敌船的桅绳，截住了汪掌柜一伙……

电影《柳堡的故事》不仅是红色文艺经典，还是民族文化经典，它以颇具东方神韵的秀丽与温婉，聚焦了革命洪流中的一脉支流，在独特的故事天地里抒写了军民关系、阶级矛盾及战士的情感与责任。《柳堡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根源就在于影片通过美好的情感故事，彰显了党的先锋战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英雄本色。情感不过是考验，金色的革命光辉才是最神圣的召唤。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有这样一个镜头，青年毛泽东在雨中奔跑，怀里紧紧揣着一个布兜，生怕被雨淋湿。到了和同学聚会的面摊儿，他兴奋地向介绍了这个布兜里装的是他的宝贝。大家小心翼翼地打开一看，原来是陈独秀先生主编的《青年杂志》。蔡和森说：这可真是宝贝，杨昌济先生曾多次给我们推荐过，说是找到了救国的药方。

这本被当时进步青年视为宝贝的《青年杂志》就是后来《新青年》的前身。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看到国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通过反思辛亥革命的教育，他认为首先要改变人的思想，必须要办杂志。陈独秀找到安徽老乡、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请他帮忙办一本杂志。于是，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

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陈独秀撰写《敬告青年》一文寄语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毛泽东还和同学们一起热议陈独秀《敬告青年》中关于新青年标准的这段话，毛泽东觉得陈独秀说的这六条标准还不够全面，应该再加上一条，即“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中，是这样介绍这本杂志的创刊意义的：“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

1917年，陈独秀受聘于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到北京。今天北京东城区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20号（旧时门牌是箭杆胡同9号）就是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也是陈独秀在北京的旧居。这里原是一座清代的四合院私宅，南房的三间是陈独秀及妻子高君曼、儿子陈鹤年、女儿陈子美1917年至1920年间的住房。现在的南房为“陈独秀在北京”专题展。

陈独秀携《新青年》进北京后，刊物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并成立编委会，编委们聚会的地点就在此，这里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等都曾担任《新青年》编辑。

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起，《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走进编辑部旧址，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由这一期封面构图而制作的屏风。正是在这一期上，李大钊发表了《青春》一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他提出改良文学的八条建议，鼓吹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小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白话小说，发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呐喊，对封建社会作了椎骨敲髓的讽刺批判。这部小说是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重要标志。

《新青年》杂志对当时的进步青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毛泽东在延安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朋友送给他一本《新青年》，周恩来在其日记中专门提到这件事，“及至到了东京，又从李冲处看见《新青年》的三卷全份，心里头越发高兴”。被《新青年》杂志

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青年人，后来有不少加入了共产党。

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当时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刊物。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从1918年7月开始，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9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在第五号、第六号上连载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改版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后，《新青年》改组为季刊，正式成为中共中央第一本机关理论刊物，开始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和策略，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大革命高潮的兴起作出了贡献。从1915年到1923年，从创刊到停刊，《新青年》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它见证了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历史过程，出色完成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宣传信仰和主张的特殊使命，因此在党的宣传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随着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如今来《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参观学习的青年人络绎不绝。这座小四合院的中间有一个凉棚，放着一张竹桌，几把竹椅。墙上是一面浮雕，浮雕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几位《新青年》的大编辑们

意气风发、栩栩如生，有的正在慷慨陈词，有的正在执笔记录，有的捧着杂志认真审读。当年的他们，可能正在这里召开一场编辑部的选题会，可能正为某一篇文章而争论。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他们为了寻找救国救民之路苦苦求索，作为一名新时代的编辑，我望着这面浮雕，感慨万千，一种使命感从心底油然而生。

呼唤『赤旗的世界』

□ 戴菁